

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唯物史观定向

易美宇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关键在于发挥唯物史观的定向作用,以利于构建自主的文明叙事体系,增强人类文明叙事的实践品格。要以“文明维新—文明探索—文明建设—文明跃迁”为主线,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维度勾勒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轨迹;以“人民群众—百年大党—中华民族”为主体,描摹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整体画像;以“价值实践—价值超越—价值使命”为锚点,宣扬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以“彰显特色—开辟空间—创造条件”为路径,开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46}等方面的论述为中国文明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提出了新要求。总体来看,理论界在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世界意义和实践路径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的研究也正在快速展开,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鲜有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等定向性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研究。叙事定向决定了特定的文明叙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超越传统文明叙事的新文明叙事,关键在于对唯物史观叙事实践品格的自觉承继。因此至少要解答以下四个定向性问题: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根本动力机制是什么? 第二,它是由谁创造出来的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主体性? 提示了什么样的新主体性? 第三,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进步意义? 第四,从以上回答中,能够印证和发掘唯物史观的哪些历史辩证法? 这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什么一般性的方法论启示? 以上问题的解答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科学的文明叙事定向。

一、动力叙事:自觉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97}唯物史观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揭示了文明形态生成演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在自觉把握社会

[收稿日期] 2024-01-11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5-06-25

[基金项目] 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KS006)

[作者简介] 易美宇(<https://orcid.org/0009-0007-1758-5913>),男,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科学判定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不同的文明任务,最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确证了唯物史观文明动力叙事的科学性,还为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旧邦新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中新文明社会条件的革命重塑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使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从绵延几千年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开始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文明叙事的核心要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其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这反映出这一时期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文明叙事的不彻底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使“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3]27}暴露无遗,另一方面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契机,为中国接受“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叙事创造了条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人逐渐认识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结合起来^{[4]49},是“再造神州”“中华维新”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确定了共产主义新文明目标”^{[5]7}。虽然文明目标大致决定了文明实践的方式,但理论原理与实践路径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只有在对社会现实矛盾运动的辩证考量中,才能寻到正确的革命路径。尽管毛泽东是在1957年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用社会基本矛盾范畴加以概括,并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在此前的社会分析中没有使用矛盾分析法。历史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结构等的分析,才准确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而在整体上将“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6]178}判定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同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历史形势中,我们也能发现中国共产党能够实际地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交替的特点。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把阶级矛盾视为社会主要矛盾,最终克服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抗日战争时期,党把民族矛盾视为社会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党紧紧依靠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新的共产主义文明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二)文明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积极调适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重生,在政治上层建筑上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政治、法律等制度,在观念上层建筑上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以其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新中国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先于经济基础出现,并未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因为在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具有彻底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因此,只能通过革命先行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核心,并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新中国的国家政权一经建立,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在经济上采取了果断措施,使新生的政权站稳了脚跟。然后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用7年的时间有步骤地完成在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新中国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矛盾。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判定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强调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7]557},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从此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和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来看,这一探索过程显然是非常曲折的,实践证明这种曲折性根源于与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脱离。在反思“大跃进”时期的“左”倾思想及其造成的重大损失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要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和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8]150}。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新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民族的、阶级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和完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纯粹地采取公有制形式,这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要朝着服务这一特殊的经济基础的方向努力。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道路探索通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新文明作出了总体性的内在规定,同时认识到新的文明形态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统一体,为之后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三)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创造性突破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9]4}这一论述基本上确立了该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54}。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事求是地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设置发展目标、选择发展模式,在保证经济和社会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倡导经济性机制,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利用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高效率,进而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现代化”^{[11]163}道路。通过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得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凸显。总之,中国共产党不仅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还通过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变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手抓”,发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实现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正是通过对外开放,中国才能在全球现代化和世界文明实践中考量自身文明实践的位置和意义,在与世界各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交流中,凸显自身本质与特色。这是与近代被动融入世界历史根本不同的一种主动性融入,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及其背后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些都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根本遵循和自觉发展。

(四)文明跃迁: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阶段性质变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主动融入开始转向主动创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阶段性质变,就文明意义来看,这一阶段性质变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定的社会形态作为“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12]604},其内部要素始终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矛盾运动中。在这些要素及其组成的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和关系,它们在彼此的矛盾运动中得到发展,进行量的积累,当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和其他要素一起推动整个社会形态发

生质变。

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它所产生的质变必然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这种变化所形成的文明成就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的发展阶段,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判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11}。从生产力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逻辑主线。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系统集成式改革,生产关系得到了结构性改善,政治上层建筑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观念上层建筑得到了极大丰富,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为文明跃迁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创造力。同时,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13]2},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三位一体”推进,再向涵盖着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的“五位一体”跃迁,最终形成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五位一体”的人类新文明崭新格局。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阶段性质变”,尤其是较为成功地规制了资本技术的系统性权力^{[14]26},为创造具有超越性的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15]3-4}。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完善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总之,坚持把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原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这一动力叙事,既是厘清自身生成史的关键,也是其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根本所在。

二、主体叙事:人民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精华的崭新创造,蕴含着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原理,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彰显出具有原则高度的主体性自觉。人类文明新形态主体叙事的唯物史观定向,既要澄清历史的真正创造主体,也要破解传统文明交往秩序的主体性困境,更要发挥文明叙事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一) 人民群众: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主体

纵观人类思想史,关于文明的主体叙事大多充满谬论,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无法真正说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通过实践哲学范式革命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提出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创造社会历史的颠覆性论断,完成了对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超越,由此解开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之谜。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实现的文明跃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质变过程,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实践奋斗方能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充分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16]3}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论断。一方面,人民群众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主体。实践是批判性创造,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文明实践主体,充分展现出主体的首创精神。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是文明新形态的叙事主体。当下的西方现代文明叙事主体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其叙事所指乃是资本增殖,诸如平等、民主、自由等借用理性的力量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与现实往往背道而驰。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7]288}。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人民创造,也应由人民来叙说。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应是关于全体中国人民创造文明新形态的真实性叙事,同时也是由人民群众自觉传扬并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人民性叙事。当然,从广义上的“人民”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创造,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离不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二)中国共产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领导主体

人民创造历史、推进文明进步,离不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领导主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政党作为特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日益成为组织、动员和领导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特定资本集团的利益,这决定了它无法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统合各个层面之主体的利益关切,调和其组织起来的社会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巨大矛盾。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文明愿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之艰巨、理想之远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使命型、文明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14}的不断自我革命,全面提升自己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1]15},把群众、阶级、政党的主体力量整合为推动文明发展的伟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不断得到锤炼,组织人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本领不断增强,实现了“使命—文明型”与“先进—引领型”双重意义上的卓越成长,真正跳出了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领导主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全国人民不断解放和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驳斥“历史终结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更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

(三)中华民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主体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回事。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现代化的精神旨趣、历史演变与发展路向,是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命力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主体性的必由之路。

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明实践,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出发,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8]。“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唯物史观视野中中华文明的新型表达”^{[19]44},我们要讲清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质,就必须首先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如何走向现代化文明的,这是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20]11}的内在要求。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发展历程,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明标准来叙说中华文明。近代西方文明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其先进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因其话语体系背后隐藏着“西方中心论”的价值指向,愈发呈现出虚假性。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特质,需要在追求理论科学性的同时,坚持理论的现实性,在实践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21]106}、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22]17}为代表,中华文明的自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渐建立起来。2002年开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构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23]9}。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理论上不断得到确证,在叙事上不断得到澄清。

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为破解西方文明主体性困境提供了

经验和智慧。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是西方确证自身主体性的一般性框架,其在世界文明秩序上的现实表现是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自由国际秩序”等为幌子的“自由帝国体系”。从其更为深层的思想基础来看,则是“文明等级论”“西方中心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等殖民话语的表征。而以中华民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的则是一种民主化的文明交往秩序,进而推进人类文明交往范式的主体性转换。从理论逻辑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普遍性是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对资本主义同一性文明叙事的根本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叙事以“文明/野蛮”“传统/现代”为标准来划分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把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尤其是西方现代化标准强制性地作为其他文明发展的“规定动作”。以这种同一性来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不仅不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最终还会阻碍人类文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尊重各文明的主体性,承认文明之间的差异,并把这种差异视为文明新形态的普遍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24]29}。这种基于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获得世界人民普遍认可和支持的基本前提。从实践逻辑来看,人类文明形态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践成果,也是广大热爱和平、谋求发展的世界人民群众和热爱和平、谋求进步的民族与国家的合作结晶,他们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生成的群众基础与现实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全面展开等,生动地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力和实践推动力。应当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以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作为文明交往的原则,真正破解了西方资本主义“自我—他者”的主体性架构,它不断呼吁各个文明体打破民族界域和“零和偏见”,在自身主体性的彰显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伟大的创造力。

三、价值叙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近代西方文明叙事中,事实与价值往往并不统一,在资本主义文明叙事中,事实与价值的割裂更为显著,其所宣扬的价值理念失却了曾经具有的历史积极性质,沦为资本逻辑的能指符号与意识形态话语。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是唯物史观叙事的显著特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文明叙事的价值逻辑,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价值规定。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不仅是关于文明形态演进的事实叙事,也是关于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叙事,因此要在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中,全面展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层的人民情怀、深厚的民本传统、宽阔的世界胸襟与高远的进步追求。

(一)以人民为中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实践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5]17}。就其价值意义而言,“两个结合”既原则性地承继了唯物史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又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大同”愿景,超越和克服了西方价值叙事的抽象性、虚伪性,赋予价值叙事以历史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实现了文化价值层面上的理论创新,以人民为中心是这一价值逻辑创新的集中表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26]58},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于唯物史观的中国文明逻辑中,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唯物史观文明叙事的价值立场。一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文明新形态奠定价值基础。文明新形态强调物质和精神都富裕,强调全体人民都富裕,强调在实践中取得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实现了富裕内涵、富裕主体、富裕路径和富裕时序的创新发展。二是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保证。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叙事迷恋形式的、抽象的民主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着力发展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大程度地激发民智、汇集民意、保障民权、凝聚民心、集中意志。三是以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为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载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良性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破解传统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人类文明存续提供方案。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把解决民生社会问题作为文明创造的基本前提,坚持以发展促民生,以实绩惠民生,以制度保民生,推进整个社会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经历了“学习世界普遍性、强调民族特殊性和创造人类普遍性”的辩证历程^{[27]6},因而“是蕴含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特征的新形态”^{[28]11}。这一历程本质上是破解资本价值幻象与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历程。这样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具有以民本扬弃资本、从特殊价值走向共同价值的趋向。在中国日益走入充盈着资本主义价值叙事的世界舞台中央时,作为其文明成果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价值立场上必然表现出超越由资本所规制的普遍性价值的一种新的普遍性价值叙事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全新的普遍性价值,具体体现在各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中,是当代人类价值的“同心圆”和“公约数”。人类文明新形态自觉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自身价值叙事的核心任务,倡导全世界文明一道弘扬各国本来就有的、人类共享的价值。这一价值是以价值多元性为前提的包容性价值共识,是促进不同文明体共同发展的共生性价值共识,是不同文明体追求自身精神文明进步的逻辑递进,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具有本质区别。另外,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尊重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的基础上,把自身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各国人民利益之实现中去的价值共识,与抽象、悬设的“普世价值”也具有本质差别。

(三)昭示文明进步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使命

文明进步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指征。东欧剧变后,弗朗西斯·福山立即指出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历史的终结”^{[29]1}。实际上,福山承认的历史进步至多只能是被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框定的历史进步,而他指出马克思也是历史终结论者,则表明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如果他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哲学意义具有正确的认识,那么他就会明白自己的论断何其荒谬。实际上,“历史终结论”也是“文明定型论”,或者按照福山本意而言,亦是“资本主义文明永恒论”,是打着文明进步的幌子为资本主义文明站台的虚伪话语,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文明叙事。与之相反,唯物史观把社会存在作为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为人们客观呈现出历史演进的整体图景。进一步来看,如果说历史演进规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客观事实,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文明是否属于历史进步呢?也就是说,唯物史观的文明进步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畅想中得到答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53}在全球文明进入大变局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文明逻辑对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文明及其困境进行自觉审视,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1]23},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世界人民寻求到现代文明的进步方向。

总之,唯物史观叙事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叙事,要求我们既要讲清楚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也要突显社会历史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叙事的唯物史观定向,必须围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旨归,讲清楚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实践,弘扬它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宽广胸襟,以及它从原则高度上破解现代文明主体性困境的进步追求。

四、规律叙事：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激活与开显

“文明需要辩证法来宣告和引导，辩证法需要文明来丰富和发展。”^[31]³¹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辩证法，既是言说文明演进的科学原则，也是文明形态变迁中展现出来的客观规律，更是文明新形态进一步发展完善所需要遵循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及的辩证法内容非常丰富，出于对动力叙事、价值叙事和主体叙事分析中的辩证规律加以凝练，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发展所需坚持的方法论加以概括的目的，这里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法叙事：一是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彰显文明特色；二是要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中进一步开辟文明发展空间；三是要通过对现实性与可能性的辩证把握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新的跃迁。

（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彰显文明特色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共产主义文明的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特殊性的统一。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文明路标，后者分有前者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其自身的特殊性体现着共产主义文明的普遍性，它拒绝把共产主义教条式地加之于自身的文明实践，而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实事求是地探索共产主义文明。二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的统一。西方开启并推动了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起系统的现代化知识体系。这一现代化知识体系在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其与资本逻辑本质勾连，也呈现出鲜明的支配性和同一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对西方现代化叙事中的文明“药方或公式”^[2]⁵²⁶保持审慎态度，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一元多线”^[32]⁶¹发展路向的现实提示，在抵抗西方现代化“同一性暴政”与借鉴西方现代化优秀成果中，艰苦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克服现代性弊病的文明发展之路。三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性与中华文明存续的特殊性的统一。“必须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上鉴别文明形态”^[33]。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承继和赓续中华文明的精神谱系与文化血脉，并在进一步的世界交往中，既表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精神，吸收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又秉持自身独特的品格个性与文化禀赋，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二）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中开辟文明发展空间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叙事无法理解社会历史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要么把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抑或绝对精神，要么彻底否定社会历史具有客观规律，这显然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前见所引致的理论谬误。在唯物史观看来，“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34]¹⁹⁴。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显然是一种“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的社会形态，其“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34]¹⁹⁴，但这种摆布的偶然性背后存在着表现为“自然的必然性”的内在规律。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内在规律是困难的，更不用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其加以利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意味着人类控制和支配社会活动及其过程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意味着人类社会形态摆脱被偶然性支配的“史前史”，朝更高的文明形态发展的大幕已徐徐拉开。具体而言，这一规律具有如下方法论启示：一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证成了文明形态演进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又彰显了这一过程的自由性，是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进程中的飞

跃性事件。二是自然必然性和人类主体性的统一。唯物史观认为,自然必然性与人类主体性统一于实践,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与文明。因此,在文明叙事上,唯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才能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摆脱那些仅仅从观念、人性、道德来规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在文明实践上,唯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才能既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铺陈出历史必然性,又为主体现实地创造历史、推进文明进步开辟出无限可能性。显然,这是对历史终结论、历史宿命论等虚假文明叙事的根本超越。

(三)在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中创造文明跃迁条件

可能性与现实性表征着事物存在和发展中所具有的两种不同性质和趋势的关系,在一个事物中,二者既对立又不可分,事物的现实性潜隐于可能性,可能性是潜在的现实性,它要转化为现实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生成与未来发展也遵循这一辩证法规律。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文明成就,对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反复总结经验教训,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推动有利条件转化为文明现实,人类文明新形态才从不可能成为可能,直至成为现实。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现实较之于其更高的文明追求而言,又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态,这里的“创造了”之意不仅表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和基本轮廓已初步形成,还更多地含有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之意。进一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就已经经历万难,其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又需要付出何等努力?站在更高的文明起点,我们要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唯物史观叙事,揭示其蕴含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辩证法,提醒人们警惕那些坐享其成和畏难苟安的错误思想,鼓舞人们继续在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中奋斗前行,开创美好未来。概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自动实现,而是必须继续依靠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为有利于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可能性创造更多条件,使其转化为现实。同时还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将不利于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可能性降至可以控制的地步,不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新的跃迁。

五、结 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交织着激烈的文明叙事博弈。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肩负着挣脱由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文明叙事之束缚的使命,这一使命要求它必须自觉运用真正的历史科学即唯物史观来考量自己。毫无疑问,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自觉遵循唯物史观之原则和方法中生成的,并为新的人类文明叙事提供了鲜活厚重的文明实践基础。只有坚持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唯物史观定向,才能科学阐释其总体性内涵,才能准确把握其超越性特质,才能清晰预见其光明的前景,才能彰显中华文明叙事的实践品格。而就文明叙事体系而言,坚持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唯物史观定向,更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前提。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3] 谷生秀、尚庆飞：《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百年演进及其经验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第26-37页。
- [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60页。
- [5] 鲁明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生成与文明叙事》，《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4-13页。
-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8-189页。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 [8] 常明明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13]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 1800—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
- [14] 严静峰：《资本技术的统治及其规制》，《哲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26-36页。
- [1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
-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 [17]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 [18] 刘梁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之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8日，第1版。
- [19] 李丽：《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第44-52页。
- [20]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4-10页。
- [2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 [22]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
- [23]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第4-9页。
- [24] 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2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26] 田旭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第56-66页。
- [27] 沈湘平：《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视角》，《哲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5-14页。
- [28] 顾海良：《“坚持中国道路”的历史回溯和时代蕴含》，《红旗文稿》2022年第2期，第4-11页。
- [29]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30] [德] 马克思、[德]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67页。
- [31] 白刚、那玉：《文明的辩证法：〈资本论〉的一种解读》，《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31-39页。
- [3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 [33] 侯惠勤：《论人类文明新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5-18页。
- [34] [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Orientation in Narratives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Yi Meiyu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re intertwined with intense contests over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concern the driving forces, principal actor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specific forms of civilization. They are essential activities for defining national identity, articulating positions, and demonstrating values, increasingly exhibit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power in the practi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esents itself with a narrative mission: to break free from the global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 constructed by capitalism. Achieving this mission necessitate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serve as the intrinsic foundation of its narr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directional guidance for narrative construction, forming the cornerstone for cultivating 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narratives and establishing an autonomous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 system for China.

As a genuine “science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eals the intrinsic laws of social history through a revolutionary philosophical paradigm rooted in a scientific view of practice. Thus, adherence to the scientific view of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its narrative quality. This scientific view of practice is intrinsically related to dynamics, subjectivity, values, and methodological laws—areas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the critical weaknesses in the illusionary narrativ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 narrativ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an innovative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 derives its novelty from its conscious inheritance of 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determine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break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especially the illusionary narratives of capitalism, and to concretely elucidate the dynamic mechanisms, subject dimension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intrinsic laws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doing so, it provides a scientific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 model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dvance human civilizational progress, demonstrating the practical guiding force of scientific narratives.

In the narrative of dynam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reate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by consciously addressing fundamental and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is narrativ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driving forces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subjectivity, the people are regarded as the general creative subjects of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On this basis, a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 structure of “the mass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s proposed, forming a vivid image of the subjects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o creates, leads, and develops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value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narrativ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a factual account of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but also a value-oriented narrative about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must unify fact and value to fully showcase the profound popular sentiment, rich tradition of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broad global vision, and lofty progressive aspirations embodied in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For whom is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created, and what are i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ultimate pursuit?” Finally, in the

narrative of laws, the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insights from the dynamics, subjectivity, and value narratives condenses into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essential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se include three aspects: (1) highlighting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e narrative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2) expanding developmental space through the narrative unity of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and (3) promoting new leaps forward by dialectically balancing reality and possibility. This narrative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are the underlying laws and methodologies?”

Key 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第三届数字贸易论坛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加强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第三届数字贸易论坛于2025年6月20日至22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顺利举行。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数字贸易论坛主办,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开放型经济与发展优势特色学科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两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数字贸易学科前沿问题,为服务国家数字贸易高水平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在开幕式上,山东财经大学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数字贸易论坛秘书长洪俊杰,浙江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先海先后致辞。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数字贸易论坛副秘书长马述忠主持。

开幕式之后是论坛的主旨演讲。在第一阶段的主旨演讲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秘书长林桂军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数字贸易边境和边境后壁垒”的报告,分析了当前我国存在的数字贸易现实壁垒,进而提出了十大类数字融合岗位,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能更加主动地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实现数字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洪俊杰教授作了题为“数智时代的商务人才培养”的报告,指出数智时代商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服务国家需求,培养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国际商务人才。黄先海教授以“创新范式的大变革与第三大宏观政策建构”为题,深入剖析了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大时代下独特的创新范式与新宏观政策体系。

在第二阶段的主旨演讲环节,南开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数字贸易论坛秘书长盛斌发表了题为“创造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双向赋能”的报告,强调未来亟须在教学、研究及政策层面加强双向赋能探索,推动形成高效、安全、包容的“AI+贸易”新生态。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春超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就业格局”的报告,指出在劳动力总量减少与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AI技术通过影响就业数量、结构及质量,重构了中国就业格局,并强调应对挑战需构建人才培养、市场发展和政府服务的三维协同体系。

在第三阶段的主旨演讲环节,阿里巴巴1688总裁余涌先生作了题为“从产业看‘数字贸易’的教学模式”的报告,指出AI与稳定币正深刻重构全球贸易,新的革新方案包括建立高校、1688、企业三方联动的实战实验室,以“产业浸泡计划”更新课程,淘汰陈旧科目,允许学生用店铺GMV替代毕业论文等,以助力数字贸易教育新生态的构建。马述忠教授发表了题为“数字贸易课程建设与学科发展”的主旨演讲,强调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打造原创性教材的重要性。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水军发表了题为“数字鸿沟视角下的供应链中断与重组”的主旨演讲,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数字鸿沟下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显著提高,破局路径在于低数字化企业通过数字化升级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实现稳链和扩链。

6月21日下午和22日上午,3场专家论坛和15场平行论坛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相继开展。在分会场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贸易数字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平台、数字产业集群、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等多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论坛圆满结束。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第三届数字贸易论坛立足学术研究前沿,聚焦重点重大问题,以其创新性的学术理念与前瞻性的学术视野促进了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

(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 供稿)